

防止繁榮穩定受衝擊 維護香港最大利益

沈家榮 香港僑界社團聯合會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監事長 中國僑聯常委 天津市政協常委



沈家榮

「一國兩制」順民意得人心，切實保障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值得警惕的是，近期本港反對派勾結「台獨」，企圖將台灣「反服貿」的違法暴力引入香港，為同樣違法亂港的「佔中」「打雞血」，破壞香港的營商環境，損害廣大市民的切身利益，更影響香港與內地的良好合作關係，讓香港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廣大市民一定要堅決擁護「一國兩制」，擁護中央對港的管治權，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嚴厲懲處違法「佔中」的搞事者，維護香港良好的社會治安，決不能讓香港步台灣「反服貿」後塵，重蹈癱瘓管治、衝擊經濟的覆轍。竭力防止香港的繁榮穩定受到衝擊，符合香港的最大整體利益，相信一定能獲得港人的肯定和支持。

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提升香港競爭力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堅持鐵腕反腐和深化改革兩手抓，回應人民最關心的問題，國家發展呈現嶄新局面。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歐洲，受到各國高規格的热情接待，充分反映世界高度重視與中國的友好合作，創造互利共贏。中央一如既往支持香港全面發展。今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大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我們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全面準確落實基本法，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大力發展經濟、有效改善民生、依法推進民主、維護社會和諧。這給予香港市民極大鼓舞，相信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現代化進程中，將為香港帶來更大的發展機

遇，有助提升競爭力。

中央真心誠意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香港也需要把握機遇，加強與內地的全方位合作，將中央的支持轉化為自身發展的動力。現在本港社會必須清楚地看到，有極少數激進反對派對中央的誠意和善意無動於衷，執意要搞違法的「佔中」，企圖達到所謂「真普選」。近日台灣「反服貿」運動愈演愈烈，更讓本港激進反對派感到興奮，積極向「台獨」取經，企圖仿效台式違法暴力抗爭，發動大規模街頭運動，把「佔中」也搞得轟轟烈烈，讓香港成為不能管治的地方，在國際上打響名堂，以威脅中央在普選問題上向反對派低頭讓步。

「佔中」對港百害而無一利

「佔中」一旦成事，甚至在「台獨」影響下鬧得難

以收拾，對香港造成的傷害將難以估量。首先，本港經濟受到的打擊首當其衝。中環是香港的政經中心，「佔中」癱瘓金融業的正常運作，本港著名經濟學者雷鼎鳴教授曾估算，若癱瘓中環，香港將日損16億元。近日筆者與金融界人士談及此事，他們對「佔中」的憂慮更甚，認為「佔中」對香港經濟的傷害遠遠不止每日16億元。因為「佔中」引發無休止的政爭，外來遊客、外來投資都被嚇跑了，樓市股市大跌，資產大幅蒸發，損失將是天文數字。難怪長和系主席李嘉誠亦指出，「佔中」每一小時都對香港有損害。」

其次，「佔中」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治。《基本法》保障港人擁有充分表達訴求的自由，普選也必須依法進行，根本不需要也不能容許以違法的「佔中」來表達意見。激進反對派先入為主地假定自己的普選方案代表民意，硬要中央、特區政府、社會大多數採納他們不符合基本法的方案，否則就要「佔中」，這本身就是反法治、反民主的做法。為了達至所謂的真普選，不惜破壞法治，這是動搖香港的核心價值。

「佔中」還會破壞香港與內地的良好關係。香港與內地發展已密不可分，加強兩地合作是大勢所趨，「佔中」的矛頭直指中央，要令香港與中央關係劍拔弩張，這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目前世界各國都希望與中國合作共贏，「佔中」師從台灣「反服貿」挑撥兩地矛盾，抗拒兩地融合，實在是逆流而動，讓香港

自我弱化優勢，自陷邊緣化。

遏止「佔中」勿讓港陷入災難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獨立的國家，推進普選必須符合法制框架，必須顧及國家利益，不能因為普選而動搖「一國兩制」。原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原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魯平最近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根據憲法規定，你可以不贊成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但你卻不能破壞作為整個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你必須尊重13億人民選擇的社會主義制度。凡是香港居民中的中國公民都必須遵守這條最基本的規定。」本港極少數人不接受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決定規定下的普選，不認同「一國兩制」，大可以選擇移民其他國家和地方，斷不可借普選的名義，策動違法「佔中」，打破香港的安定和諧，令香港的繁榮穩定毀於一旦，這肯定違背廣大市民的意願。

台灣「反服貿」撕裂族群，令發展停滯，「佔中」向其取經在港發難，後果不堪設想。本港必須防患於未然，以強民意遏止「佔中」。對有人敢以身試法，特區政府一定要依法嚴厲處置，絕不能將台灣的混亂搬到香港，讓香港也陷入無法無天的災難之中。

民主是良藥亦可成毒藥

愛護香港力量

西方民主制度，在不少國家或地區中，似乎開始站不住腳，就以近期埃及、泰國、烏克蘭，台灣等社會出現的各種騷亂和問題，正反映了民主的後遺症。皆因民主制度基於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卻往往又令少數人不服而生事，這些人又打着民主旗號，那不是打着民主反民主嗎？那民主又有什麼用？

民主是人民作主，看似很理想很公平，若選出一位領導者，是受人民愛戴，施政受人民支持，當然民主是最理想了！但每處地方條件不同，歷史文化亦大有分別，資源貧富不均，豈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制度？

民主既是良藥亦可以是毒藥，若少數人願意服從多數人，依法辦事，能造福社會。但民主名堂往往又被少數人騎劫濫用、衝擊社會，變成核輻射般，禍害人間。現今世界，還未出現一個完美的制度，但每個國家的領導人，應該都是愛自己國家、愛自己人民；一個國家的富強，亦必須人民愛國，支持國家發展，有穩定環境才有進步！硬搬自己一套，放在別人身上，卻又不理會別人的條件、文化、人口、民族，這便是盲目行為，完全是自負責任的表現。

我們深信，再過二三十年，人類社會的生活方式，一定會再演變，因此一個政府、政黨，必須具備與時並進、自我檢討的能力，實事求是地自我修正路線，更改方向。中國政府實行「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中國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決定不會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按照國情一步一步摸着石頭過河，發展出富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是符合全國民眾利益的。

大家不妨上香港最流行的兩大搜尋網站輸入「香港是中國的」，排名較前的結果分別是：「中國的一部分」和「中國的殖民地」。說實話，筆者對「香港是中國殖民地」一類說法十分反感。

依據《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香港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保持財政獨立，不用負擔駐軍費用，不用向國家繳納稅款，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港人組成，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這程度的高度自治，怎可說是殖民地？

太早期的殖民地便不說了，就看近代一點的南非和印度，當地人的公民及政治權利被剝奪，賦稅沉重，長期受到宗主國的政治和武裝欺壓，有色人種和白人享受到的權益、福利和機會不平等。殖民地下的原住民受到高度壓迫，甘地和曼德拉的經歷才更加教人動容，載入史冊，這一方面，今時今日的香港有可比性嗎？

再近一點，比較一下港英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港英政府設立了政治部監控、打壓社運人士，曾多次粗暴鎮壓社會運動，英國人長期壟斷香港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重要職位，英國人和華人在政府體制內的發展機會絕不平等，政府傾向英資，愛國團體多次遭到政治打壓，駐港英軍軍費由港人負責，終審機關設在倫敦，持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港人沒有英國居留權，直至港英管治晚期才急促開放民主直選制度。毫無疑問，回歸後，香港成為祖國的特別行政區，港人才可真正享受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反對派很多時對本港民主和人權狀況的評價是過分負面 and 無根據的。但是，「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19年評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試問，如港人享受不到整體性的資訊、言論和人身自由，我們有可能維持一個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嗎？香港有公正的司法覆核機制，市民、議員和媒體經常狠批特區政府，回歸以來，從未有人在合法的情況下因批評特區政府而入罪，這些客觀事實豈不證明了港人享受到高度人權和自由嗎？實事求是地看，在人權狀況方面，特區政府做得顯然較港英政府好，而且這份權利和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是不會改變的。

回歸前，英人治港，華人在港是次等公民，缺乏管治權，施政透明度低，人權狀況不理想，獅子山下的港人仍然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成功。回歸後，原來的制度大體不變，港人治港，掌握前所未有的自治權，發展條件理應較以前更加好，但如今反而陷入困局，難道不值得港人反思嗎？

讓普選討論回歸《基本法》

黃友嘉 博士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

過去幾個月，香港在政改的問題上有不少的爭拗，包括所謂「真、假普選」、「門檻」、「篩選」等。要成功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我認為應讓討論回歸到法律原意和歷史事實。只有依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辦事，才是大多數香港人接受的政改方案。

指中央在港推行「假普選」不公道

首先，我認為，說中央在香港推行「假普選」是不公道的。《基本法》明確表示特首可以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一改香港的首長由委任產生的歷史。至近期，在人大常委會更主動於2004年及2007年作出的解釋及決定中，提到按「政改五步曲」，香港在2017年可以實行普選行政長官，然後立法會亦可實行普選。這都是有法可依、有清晰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莊嚴承諾。由此可見，中央以至特區政府對履行《基本法》內「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規定和目標，都有真正的推動。如果說中央以及特區政府在推行「假普選」，我認為是很嚴重及不公道的指控。

「愛國愛港」要求理所當然

有關普選行政長官除了要根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外，還有「行政長官不能與中央對抗」或者「行政長官需要愛國愛港」的要求。這個要求，不能單單說它是一個政治要求。事實上，它也是一個《憲法》及《基本法》都有包含的法律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包括「一國兩制」的制度，來自國家《憲法》第三十條、三十一條及六十二條第十三項。《基本法》的序言亦指出全國人大是根據《憲法》制定《基本法》的，故《基本法》的權力來源自《憲法》。《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行政長官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顯然，如果行政長官不愛國愛港，根本不可能履行憲制上的職責。行政長官需要愛國愛港是有充分而清晰的法律根據，早在制定《基本法》時就有充分的考慮，不是新生事物，不是什麼新設的「政治門檻」，更不是什麼「僭建」。

我們不應該把「行政長官不能與中央對抗」這個要求看成一種保護中央的手段。這個要求最大的保障是香港。假如香港和內地在經貿、社會、法治，甚至是生活必需品的供應等眾多領域的合作出現不暢順的地方，香港市民的生活必定會受到很大影響。如果行政長官與中央出現對立的話，恐怕香港會墮入動盪與不安的深淵，最大的輸家只會是香港。

至於提名門檻，值得一提的是，就算一些獲得五萬或十萬人支持的「公民提名」建議，先不談是否合法，如果沒有大量資源是很難取得這種提名的。這樣的主張，其實也是一種相當高的門檻，效果是預先篩走一些缺乏資源或並非政治明星、但有意參選特首的人。

達成共識需政治勇氣

對「特首不能與中央對抗」這個要求無需對號入座，我絕不認為這個要求是排除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的人當特首。在此，我想提出幾點意見給「泛民」的朋友參考。

第一，我覺得「泛民」在政改的對話中，似乎覺得一個最好的政制、最好的選舉辦法，就是一個最開放、門檻最低的政制，甚至可以是一個比較民粹的政制。其實一個妥善的政制設計，要考慮很多問題。例如美國憲法列出整個政制設計的六項目的，分別是：一、建立更完善的聯邦制（即是維護國家完整）；二、伸張公平；三、確保社會安寧；四、保衛國家安全；五、讓民眾有更好的生活；六、讓人民及其後代享有自由的碩果。可以看到，一個政制設計的目的，除了讓民主得到彰顯，讓自由得到保證，讓司法公義得到伸張之外，也要顧及到國家安全、國土完整、繁榮安定、社會安寧等問題。如果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的人，也表明他們關心社會各方面的要求，我看不到他們為何不能當特首。

第二，我覺得「泛民」堅持一個最低門檻、最開放的選舉，而完全不顧及中央的角色，這是把自己帶進了一個無限追求道德高地的困局。在道德高地的追求中，是無共贏這回事的。在奧運競賽，拿不到金牌，拿個銀牌、銅牌也很光榮。但在道德高地的角逐上，亞軍不單毫無價值，甚至會被人唾棄，被人指為「出賣原則」、「出賣民主」、「出賣人民」。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個別人士可以無止境追求「道德高地」，但從整個「泛民」來看，狹隘的道德高地對政改達成共識並無幫助。中央作出香港普選的決定，已下了不小的決心。事實上，建制派中也有人懷疑，2017年普選是否太早了一點，尤其香港雖然回歸，但人心未完全回歸，普選時機並未成熟。

我相信，只有依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辦事，才是大多數香港人接受的政改方案。立法會議員不應自己搞「篩選」，篩走這個框架，而應該盡力通過以這個框架為基礎的普選方案，供市民作最終的選擇。



黃友嘉

港英管治豈能與今日特區相提並論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 陳志豪

反對派內部對上海行的政治博弈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立法會全體議員到訪上海之行，反對派各政黨經過一輪扭轉作態、討價還價之後，最終除了若干激進反對派議員之外，大部分政黨都有派代表參加，要去的終歸還是會去，不去的怎樣盛意拳拳都是不會去。毫無疑問，這次上海行是整個政改博弈的一環，反對派對於上海行的取態都有自身政治上的考量及計算。最可惜的是，一直主張務實溝通路線的民主黨，在這次上海行被激進勢力多番算計，進退失據，導致在市民心目中不斷失分，這其實也從側面反映了民主黨現時的困境。

反對派取態不同計算各異



立法會內委會通過立法會議員訪滬行。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 攝

對於這次上海行，反對派各政黨有不同取態是十分正常的。社民連梁國雄第一時間表示參與，原因是梁國雄一心為了「攞局」，在上海做驢，所以自然不會放過這次機會，而且過去幾次立法會到內地交流，梁國雄都是最為積極。其他激進反對派人士如「人民力量」陳偉業、陳志全；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及公民黨毛孟靜等，一直標榜激進路線，以爭取最激進的票源，必定要顯示出對抗的姿態，拒絕任何理性交往，否則隨時會流失基本盤，導致議席不保。所以，不論中央如何釋出善意，市民如何期望交流，他們都一定不會參與，這是屁股決定腦袋所致。

但最奇怪的，卻是民主黨與公民黨南轅北轍的取態。按一直以來的政治光譜，民主黨主要代表了反對派的溫和力量，而公民黨過去曾有與社民連策動「五區公投」、阻停港珠澳大橋工程、為外備爭取港權的往績，外界預期民主黨應會積極參與，而公民黨則會跟隨激進反對派路線。但最終的情況卻是公民黨「強陣」參與，除了黨內最激進的陳家洛和毛孟靜之外，其餘四名議員包括黨魁梁家傑都會參與，而黨主席余若薇早前更呼籲反對派應參與上海行。與公民黨的積極相比，民主黨反顯得越趨不前。

為什麼公民黨對上海行態度積極，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們確實也希望與中央官員直接溝通「摸底」，始終這是余若薇參選特首的最好也是最後機會，公民黨斷不想放棄。而且公民黨與民主黨不同，他們有與社民連發動「公投」的「激進歷史」，有了「免死金牌」，就算與中央溝通也不會

被激進派盟友責難，可以輕裝上陣暢所欲言。二是由於民主黨不會全體參與，其他反對派政黨都只是派若干代表，這樣公民黨便成為這次上海行中反對派的最大勢力，可以預期接受訪問時公民黨成員一字排開，儼如反對派龍頭發言人，大有主導政改談判之勢。民主黨自願讓位，公民黨哪會放過？

民主黨進退失據

而民主黨則最令人可惜，本來這次上海溝通之旅，主角應該是民主黨等反對派的溫和力量，社會輿論也一直呼籲他們踴躍參與。現時民主黨雖然有派代表隨行，但在過程中總給人左搖右擺，不夠堅定的感覺。當中主要原因，固然是由於激進勢力的狙擊施壓，當民主黨一展現務實的取態時，各種攻擊立即蜂擁而至。但更重要的還是在於民主黨既想溝通，又怕被責難的更甚，總想左右逢源，結果反被黨內的激進少壯派綁架，導致兩面不是人。

事實上，政黨的生命在於政治光譜的定位。激進勢力早已搶佔了極端的一翼，其他如公民黨、工黨甚至於新民主同盟等，不論你是否認同他們的政治立場，但至少他們都是路線明確，讓選民容易辨別。但民主黨呢？究竟是溫和還是激進？是對抗還是溝通？他們總是不斷在變，不斷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這在政治上是死路一條。多年來，在每次政治大風大浪中，民主黨都有司徒華為其作出抉擇。但現在民主黨卻缺乏明確的政改立場，是與激進反對派爭極端的一翼，還是開拓廣大的中間選民，現在就要看民主黨領導層的決心了。